

第一本纪念鲁迅的大型文集

王永昌

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，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。消息传开，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，大都发表文章，对他表示悼念。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成立，会上决议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前，将过去发表的文章和有关材料搜集整理，汇编成册。经过紧张的工作，第一本五十万字的纪念文集，终于如期问世。它虽然成书于四十多年以前，但我们今天读来，仍感到十分亲切，这是一部难得的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文献材料。

再现了鲁迅的光辉形象

鲁迅逝世以后，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中，成千上万的群众，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。在芬芳馥郁的鲜花丛中，他安祥的躺着。由于他和人民群众太亲密了，以致使许多人感到他并未逝世。巴金同志在悼文中写道：“这难道不是梦？……倘使这个老人一翻身坐起来呢？”^①

是的，鲁迅并没有离开群众，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。集内有很多文章，回忆了他的声音笑貌，再现了他的光辉形象。如写他出现在会议场合，“仍然是稍为蓬乱的头发，黑色浓眉，黑色胡子，脸

皮上,眼光里,都含着饱满的精神,”写他出外上街,则是“挤进了三等车厢,就屹然地站立在人堆当中,虽然矮小,却显得倔强;明锐的眼光时时扫射在同车的人们底身上,时时又定定地瞪视着远方”。平时和朋友交谈,他是那样从容,妙语惊人,发人深省;一旦译作起来,却是满案书刊,奋笔疾书,饭顾不了吃,茶也忘了喝,“左手拿着烟,右手执了笔,聚精会神的工作,其紧张程度是可怕的”。尤其是在大病之后,他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,因而用一种“赶着做”的心情,来从事一切工作。黄源同志记述:“有一个酷热的下午,我二三点钟到他家里。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客堂的书橱旁的席子上,铺在地上的席子上,一身短衫裤,显着骨瘦棱棱的四肢,正弯着腰在摺叠珂勒惠支的《版画选集》。”请看,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幅剪影啊!

讲究文明礼貌,对人體贴入微。凡是亲身接触过鲁迅的人,无不具有这种感觉。大病之中,有朋友来看望他,尽管自己十分疲惫,也要“挣扎着立起来招呼”。远道而来的人,大都留着吃饭,深夜而去的人,一定要代付车钱。送给朋友的书刊,如果发现有一个皱折,总要“另挑一本”,朋友送他书刊,也要细心保存以示郑重。有人记述,鲁迅送他一本《引玉集》,他打开来翻了一翻就要带走,但是鲁迅“连忙把书拿回去,仔细地套好(外壳),整整齐齐地包起来,套上橡皮圈”,然后,请他带走。细致周到,一丝不苟,虽在细微之处,也体现了他的这种精神。看了这些栩栩如生的描绘,使我们觉得鲁迅的音容笑貌,宛然犹在目前。

表达了群众的深切悼念

然而,鲁迅是确实逝世了。巨星陨坠,举世哀恸。消息传开以后,有的人“好像触了电,全身一震,眼前昏黑,一时失去了一切的感觉”,有的人“头只是在昏,心只是在跳,耳只是在鸣,站在室中

间,只是发呆,发抖,舌根硬得道不出只字”;就是和鲁迅素未一面,未通一信的同志也感到打击沉重,“第一次经验到死耗给与的最大痛楚,好像心里给压上一块石板,给塞了一团棉絮”。这些当时被记录下来的心情,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古往今来,一个人的生命能和这么多的群众息息相通,血肉相连,实在是屈指可数,为数不多的。

十月十九日,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,郭沫若同志感到十分悲痛。他在当天夜里所写的《民族的杰作》一文中曾经记述,傍晚他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,疑心不确,冒着大雨从邻居家证实了这个噩耗以后,“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觉地也酝酿起了雨意来”。写了这篇文章,感到意犹未尽,十天之后,接着又写了《不灭的光辉》一文,热烈赞颂了鲁迅“秉着剑倒在战场上的精神”。茅盾同志也连续著文悼念鲁迅,说鲁迅所作的工作,“是一把坚利无比的宝剑,现在他死了,这把宝剑留在战场上,……需要我们无数的后死者共同举起它来,艰苦地学会使用它的方法”。其他友好如许寿裳,曹靖华等人,除了专电吊唁以外,也都连续著文,追忆鲁迅,甚至连失去自由的丁玲和身陷牢狱的适夷,也都冲破阻力,或发电,或撰文,对鲁迅的逝世,表示深切的悼念。集内收录的一篇苏联通讯,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:十月二十三日,苏联作家理定,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和几个由西欧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谈话,谈中国的文化和文学,那几个学生说,中国有中国的高尔基——鲁迅。过了一会,火车停在一个站上,他下去买了一份《真理报》,看到鲁迅逝世的消息,马上进车来告诉这些中国留学生,他们听了大为悲痛,有两个人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理定说,“我从这里才知道鲁迅之伟大,知道中国青年是如何敬爱鲁迅的”。一滴水能看出大海,所有这些记载,为我们留下了多么珍贵的一页历史。

集中表现广大群众对鲁迅敬爱之情的场面,是十月二十二日

的送葬仪式。许多文章记述,这一天早晨,没有谁下命令,没有经过特别邀请,送葬的群众,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赶来。先是依次在灵前恭立,行礼,流泪,哀悼,然后跟随着灵车,顶着秋阳,忍着饥渴,步行二十余里,去参加落葬仪式。鲁迅生前行动失去自由,直到逝世以后,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撤销对他的“通缉”,然而广大群众,却不顾这些,冲破一切阻力,赶来为鲁迅送葬。具有戏剧意味的是,当时某些官僚,也曾装模做样地送了几幅挽联,然而在送葬的时候,他们的挽联,“东倒西歪地倒在短树丛里”,这一敬一鄙,把人民的爱憎之情、表现得多么分明。当盖有“民族魂”白旗的棺木,伴随着群众的哀悼徐徐入墓以后,含山的太阳已经落尽,清辉的月光洒遍了大地,送葬的人群,这才怀着怅怅的心情,缓缓离去。邹韬奋同志说,这“无疑地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民众从心坎里所公认的一个伟大的领袖”。

赞颂了鲁迅的正确道路

鲁迅逝世以后,许多悼念他的文章都说,鲁迅的言论著述,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。然而,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,不只是由于他的言教,更重要地是在于他的身教。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,而且还是一个英勇的民族革命战士,这一点,不但为胡愈之同志等早已指出,就连国外出版的暹罗华侨日报,也这样认识:“单说他是一位作家是不够的,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,实践家,革命青年的首领。……先生的一生的斗争的生活史,也即是一部现代的中国的思想界的斗争史”。集内保存的无锡、青岛等地以及南京中央大学举行追悼活动的材料,尤其耐人寻味。青岛曾经是梁实秋逞雄的地方,他在那里,曾经把鲁迅著作从图书馆中予以“注消”,但这里的广大群众,却在鲁迅逝世以后,不但召开了纪念

大会,而且编辑纪念专刊。三十年代初期,南京成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中心,中央大学成为他们控制的目标之一,然而就在这个中央大学里面,却举行了一次鲁迅追悼会,一个卅一岁的青年(郭光),在会上作了发言,赞颂了鲁迅的战斗一生。指出:“鲁迅的一生,是一首崇高伟大的诗篇,是一首英勇悲壮的凯歌,他的脉搏,和中国民族的脉搏一致,和全世界前进人类共感交振”。在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南京,在国民党把持的中央大学,有人大谈鲁迅的战斗一生,大谈他的反帝反封建的业绩,人们赞扬什么,反对什么,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?要问这个卅一岁的青年,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?我想原因不是别的,而是正如他自己的发言所说:鲁迅是“中国民族有前途的保证”,是“真理胜利的朕兆”。

保存了有关鲁迅的丰富史料

纪念集有许多文章,还记载了鲁迅的言论。这些言论,很多未见于鲁迅的著述,所以感到十分珍贵。

比如鲁迅和内山完造先生谈话时,曾说中国历代政府不注意疏浚黄河,只是加高堤坝,一有溃决,势不可当,真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,使民无所措手足,“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!”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。再如绍兴风俗,小孩子生下来,在吃乳以前,先要尝五种东西,第一是醋,第二是盐,第三是黄连,第四是钩藤,第五是糖。在谈到这个问题时,鲁迅分析说,“醋是酸味,盐是咸味,黄连是苦味,钩藤乃是人生的刺(荆棘),即是痛苦,最后才给他尝尝人生的甜味”。经他一点,这个由来已久的民间习俗,却被赋予了很有新意的人生哲理。

鲁迅生前有许多著述计划,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。后来有的同志曾经列举清单,一一介绍。但从纪念集来看,有些东西尚被

遗漏。如曹白在回忆中曾经提到，鲁迅计划要出版一本《拈花集》，毛一波在悼文中说，鲁迅要为泰抱扑的《赤俄游记》作序，这些事情，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弄得清楚。

鲁迅不但善于作文，而且兼能绘画，这似乎已为大家所知，但过去我们只知他描过绣像，画过“无常”，画过“刺蝟打伞”，画过《坟》的内封插图，除此以外所知不多。但这本纪念集中所收的一篇巴黎通讯说，有个中国画家介绍，鲁迅“曾作过一张托尔斯泰像，系一张小铅笔画，很明显的表现了托氏的高超人格和伟大的气概，虽专门画家，恐亦不能及之”。近两年来，鲁迅替江绍原临摹的“发系马鞍图”已为我们所见，但这张托氏小像的手迹，到底落在何处，至今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如果碰到一位有心的收藏者，那么也许它还在人间也说不定！

除上述以外，纪念集还收录了其他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。如毛泽东同志担任鲁迅治丧委员的消息报导，鲁迅关于救亡运动的主张，宋庆龄关于鲁迅逝世的谈话，蔡元培回忆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和鲁迅的联系，以及适夷同志以金三笔名发表的文章，记述鲁迅和“救难会”、和陈赓同志接触的史事，这些都以文字形式较早的记录下来，为我们以后的鲁迅研究工作，提供了不少方便。而所有这些，又都是在烽火遍地的抗日战争前夕，在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时期，及时抢救下来的，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！

反映了鲁迅研究中的激烈论争

对鲁迅的活动，在他生前就有不同的评价。鲁迅逝世以后，这种论争并未停息。这从纪念集中李何林等同志对《大公报》的一篇评论、叶公超的一篇文章、周作人的一篇谈话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某些言论所表示的不同意见，就可以得到证明。

非难者说，鲁迅是一个“个人主义”者，他所表现的是一个“膨胀的强烈的自己，撇开自己想一桩事在他是不经常的”。反驳者说，鲁迅生前从不想到自己的地位和名誉，在临终以前还说“埋掉拉倒”。有些人大吹大擂，不见得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而嘱咐“埋掉拉倒”的人，“却是给全世界建树过伟大事业的人”。

非难者说，鲁迅的作品“丑角色彩浓厚”、“杂耍成分太多”；“当他专一攻击某一种对象的时候，他的文章多半是坏的”，“给青年不少不良的影响”。反驳者说，鲁迅的作品，在他们的上中学的时候，“就是国文的第一课”，成了生活的教科书，从这些人物的身上，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实和历史，岂能轻易加以否定？至于他的杂文，由于能够“批判现实，指摘现实，暴露现实，讽刺现实”，使他成了“一切被压迫者的代言人，维护真理与正义的战士”，这正好给广大青年留下“一个永远不朽的典范”，那有什么“不良影响”可言？

非难者说，鲁迅前半生“偏于消极”，后半生又变为一个“虚无主义者”。反驳者说，“中国自从有了反封建斗争以来，鲁迅是第一个有助绩的人”，“他不只是我们行动的导师，而且还是我们战场最英勇的同伴”，“消极”云云，不知从何说起，至于到了后来，那他更是炉火纯青，为他认定的真理奋斗不息，目标明确，信心百倍。诬他是什么“虚无主义”者，完全是“仰面唾天”，对他没有丝毫损害，反而嘲弄了非难者自己。

非难者又说，鲁迅前半生很有功绩，“晚年受人利用，作无谓的论战，浪费的精力”。反驳者说，鲁迅一生战斗“完全出于自觉。尤其到了晚年，“不受颐使，不出卖自己”，“用了真理的准绳，解剖了一切足以困惑青年的鬼蜮的面目”。在他的身上，“没有一个细胞是妥协的”；在他的笔下，“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”。历史俱在，这岂是某些人说一两句话，就能歪曲得了的吗？

纪念集所收的一些文章，还对当时发生的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，

表示了自己的意见。

* * * * *

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他种种原因，这本纪念集还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在编辑体例方面，四组悼文缺乏严格意义的科学分类，致使读者不易查考。由于时间仓卒，有些史实未及订正（如董秋芳悼文说西三条 21 号“是《阿 Q 正传》产生的地方”），有些原文未及核对（如曹聚仁悼文引鲁迅书信，将“唐室大有胡气”错为“大有朝气”），错字较多，未能细校，如许著《年谱》，鲁迅六岁和八岁时，公历应为一八八六年和一八八八年，结果错排成一九八六和一九八八，一字之误，相差百年，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。

尽管如此，这本《纪念集》的出版，仍有它的历史意义，许寿裳先生当年就说：“我确信将来他（鲁迅）是愈远愈伟大！”《南洋商报》在一篇报导中当时也说，这只是“纪念开始，不是纪念终结”。编者同志在本书的《后记》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鲁迅先生固然不及见到未来的新中国的建立，但是他的精神仍还是和我们、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在一起的，他会指导中华民族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。新中国的建立，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。我们热诚地祷祝那日子的到来”。现在新中国建立已经三十一年了。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，我们重读这本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，更加感到“鲁迅不死”，鲁迅精神永放光芒。

一九八一年六一前夕初稿，七月二日修改。

注：

①本文凡未注明处，均见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。